

·书评·

# 用崭新的视角研究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新著

——评《新农村视角下福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研究》

许经勇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术界研究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论文论著难计其数。但是,这些年来,无论是理论研究,或者是实践探索,更多地是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研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并断言城镇化是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途径。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步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城镇化率从 17% 提高到 5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差异不仅没有缩小,还呈扩大的趋势,出现“农村空心化”、“农业副业化”、“劳力老龄化”的负面效应。这就给作者(蔡雪雄)一个警示,应当换一个角度,即“反弹琵琶”,立足于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来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按照作者的思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并不是对立的。我国城镇化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城镇化只有建立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是具有可持续性。只有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始能加快城镇化进程。否则,就会带来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以及以农民工为载体的“半城镇化”、“伪城镇化”。正是基于上述的崭新思路,蔡雪雄同志把专著的名称确定为《新农村视角下福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研究》。这是很有创意的。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从新农村建设的视角来研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论著问世。

从新农村建设的视角来研究福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作者是这样构思的,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福建,作为海峡西岸经济主体的福建,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即与福建省相邻的浙江省,其腹地比福建省小 2 万平方公里,但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额却比福建省多一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悬殊的差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始终坚持强省先强县、强县先强镇、强镇先发展农村,把新农村建设放在首要的地位。使得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 26 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比全国平均值缩小近一个百分点,是全国统筹城乡发展做得较好的省份。福建省只要按照作者的新思路,以及借鉴浙江省的经验,以新农村建设的视角,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把发展和繁荣农村摆在首要地位,并以此带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就一定能够使福建的经济面貌发生更大的变化,把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推向更高的阶段,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民工联系起来,专章研究农民工问题,是本书的又一大特色。作者清晰地认识到,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在于我国是把城乡二元经济制度化。农民工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农民”代表身份,“工”代表职业,即到城镇打工农民身份又不让改变,就称为农民工。它是中国特有的范畴。当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的

身份差别就显现出来。即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福利。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不仅表现在初次分配,还表现在再分配,即不能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对于我国来说,农民工意味着劳动力的低成本。如果没有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提供廉价劳动力,无论是外资企业或者是内资企业,都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的发展。本书作者高度评价农民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还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但是,农民工的存在,又是和城镇化的本质背道而驰的。这就决定了,我国人的城镇化表现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第二个过程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第一个过程只能说是劳动力的城镇化,第二个过程才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农民工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城镇的缩影。城乡二元结构消除之日,就是农民工终结之时。因此,本书的作者将能否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上升到“三农”问题能否根本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能否转换、工业化与城镇化能否健康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要不要发展农村工业,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则从福建的实践经验深深感受到,只有在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发展农村工业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始能为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奠定产业基础。作者是这样分析的,即通过农村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城市化提供产业基础,通过农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拉动农村从业人员向非农产业转移,为城市化的发展奠定劳动力基础。作者的这种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与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相联系的农村工业化,突破了传统的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即在传统的城市工业化之外,产生一个新的工业化,这就是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不同,农村工业是依靠农民的力量发展起来的,对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具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与城市工业不同,农村工业采取了以劳动代替资本的发展模式,将广大农民带入非农产业领域,使大多数农民群众在工业化中共同受益;与城市工业不同,农村工业与农业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同农业的关联效应极为密切,甚至是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以这种发展模式为依托的城镇化,有利于迅速改变农村面貌,缩小城乡差别,形成新型城镇化所要求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体系,更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末尾还特别附上两篇文献,即日本的新农村建设和韩国的新农村建设。这无疑是向读者发出这样的信息,即本书之所以选择《新农村视角下福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研究》为书名,是从日本和韩国的新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得到启示的。无论是日本和韩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始终重视新农村建设,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因而没有出现我国曾经出现的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差别越拉越大的不和谐状况。长期以来,日本和韩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别,都保持在接近 1:1 的水平,日本的农民收入甚至超过市民的收入。目前,日本的人均生产总值是我国的 9 倍,韩国的人均生产总值是我国的 4.5 倍。这两个国家在几十年前早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国家很重视新农村建设、保持城乡协调发展。而拉丁美洲的 18 个国家、中非的 7 个国家、亚洲的 3 个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之所以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城乡差别悬殊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对外没有竞争力,扩大内需又没有潜力,国民经济长期发展不上去。近年来我国论坛上也在争议,究竟中国会不会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即中国的城乡差别能否缩小到最低限度,中国的城乡关系是否能够走上协调发展的轨道。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这里就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这就更加凸显作者研究新农村视角下福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战略意义。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